

前近代商人对教育的介入及其影响

李忠 王筱宁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 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 促使前近代商人借助教育奋力改变自己的地位; 成功商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介入教育活动; 商人介入教育活动对商人和教育双方都发生作用, 并对双方产生不同影响。然而, 就教育变革而言, 前近代商人介入教育的活动促进了固有教育的发展, 而制约了教育的近代变革。

关键词: 前近代商人; 介入; 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60(2006)02-0072-05

尽管商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传统的价值观念却使得从事商业者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尴尬, 成功商人多借助已有的经济力量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 途径之一就是介入教育领域, 凭借经济上优势, 在提高学术地位的同时获得政治地位。商人通过多种形式介入教育活动, 商人介入教育活动在对商人和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 消极作用也随之出现, 这种消极作用对商人和教育的影响是主要的也是深刻的。

一、前近代商人介入教育活动的原由

在古代中国, 农、商被称之为食、货, 并列于“生民之本”。然而, 由于商人被认为是不劳而获、惟利是图、生活奢侈、趋炎附势而阻碍了农业发展, 从而受到抑制。^①《管子》一书多次述及农商关系, 并对商业发展制约农业发展作出具体说明。^②将农、商对立起来, 认为抑制商业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之一。所以“重农抑商”作为“重本抑末”的政策和律令出现在中国的典籍之中,《汉书·食货志》就有“今法律贱商人”的记载。商, 作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末位, 时常被官方重申并强化, 成为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并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 关于商业知识的教授及传播也显得贫乏而幼稚, 以至于到1930年代还有人对此大加鞭伐:“我国贱商之习, 相沿已久, 商业知识, 殊甚幼稚, 即有一二豪商富贾, 亦皆市井俚俗(经纪人——引者注)之徒, 故有志之士, 多鄙而不屑”, 并将此作为中国商业不兴的四大原因之一。^{[1](p.2)}

收稿日期: 2006-03

作者简介: 李忠(1972—), 男, 陕西省吴旗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教育学博士, 从事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研究(济南250014); 王筱宁(1972—), 女,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法学硕士, 从事社会学、社会史研究(济南250014)

无论商人地位多么低贱，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商业活动，也不能缺少商业的从业者。商业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得以不断的延续和发展，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反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显得更为活跃，并且得到其他阶层的羡慕。这一状况在前近代变得更为明显，如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就出现“商居四民之末，徼俗殊不然，歛之业馘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2]的记载；在盐商聚集的扬州则是“俗喜商贾，不事农事”^[3]；在陕西三原县，“士勤学问，民多商贾……思欲转移令务本轻末，其道良难”；泾阳县为“西安县县政繁而道冲，俗美而习蔽，民逐末于外者八九”；整个朝邑则是“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4]；在山西汾阳府，“民率逐于未作，走利为鹜”，泽州则是“民就未去本。”^[5]以至雍正皇帝发出“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6]的慨叹。可见，在这一时期的一些地方，商人的职业是令人羡慕的。

商人有着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经济实力的强大不足以改变其低贱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由此在商人心里产生强烈反差和张力，使商人的心理处于不平衡状态。平衡这种心理的办法是获得相应的学术成就与政治地位，即成为“士”，获得“士”的身份和相应的职衔，办法则是兴办教育、修习儒学、参加科考、结交官府、捐输官衔等等。但是，最为正当而有效的途经莫过于熟读儒家教义以获得学术地位，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得政治地位。由于政治地位的获取并非易事，一些商人便亦贾亦儒，“贾而好儒”，“躬虽服贾，精治经史”。^{[7] (p. 445)}熟读儒家典籍，享受读书乐趣，既有利于商业的经营活动，又能够沟通士与商之间的联系，正所谓：“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8] (p. 110)}他们“修高明之行”、“利以义制”，用儒家的教义来规范自己商业行为，希望“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9]，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然而，无论如何商人也难以改变其固有身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业”，但学术地位还是难以建立。加之，科举功名不能世袭，只有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并获得成功，方得以持续。为此，他们通过身体力行，规劝自己的子弟乃至家族的子弟学习儒学，以彻底改变家庭或家族的社会地位。所以，前近代商人教育活动的理由具有高度的指向性——读书入仕——对传统价值的认同。典型的例子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致富之后，选择一些所谓“器宇不凡”的族内子弟学习儒学，以图出类拔萃、光宗耀祖。如“世居歙东新馆”的安徽商人包柏庭，“家初以贫，奉养未能隆，以后业渐馘，家颇饶裕”之后，“其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10]又如休宁《茗州吴氏家典》指出：“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紫廩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党族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非小。”^[11]而《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祠规》则对子弟学业状况作为更为具体的规定：

“凡攻举子业者，岁四仲月清齐集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赴会，无文者罚银二钱，当日不交卷者罚一钱。祠内托人披阅。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补廩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登科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旌匾，甲第以上加倍。至若省试盘费颇繁，贫士或限于资斧，每当宾兴之年，各名给元银二两，仍设酌为饯荣行。有科举者全给，录遗者先给一半，俟入棘闱，然后补足。会试者每人给盘费十两。为父兄者幸有可选子弟，勿令轻易废弃。盖

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

这种“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的语辞，出现在商人的族规中，足以说明商人对自己所处阶层的态度以及改变自己身份的途经——“读书立身”的认同。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其他阶层在羡慕商人职业的时候，商人自己却要求其子弟“读书立身”。这不仅仅是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而主要是因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读书成功了，其经济地位、学术地位、政治地位相应具备，而且还能起到光宗耀祖的作用，即令康熙皇帝也积极鼓励：“国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尔身有殊，即尔祖父，亦增光宠矣。”^{[12] (pp 218-219)}

“读书”具有一举多得之功效，有此种觉悟的商人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教育活动中，也就成为自然。有人统计，著名商帮——徽商所在的徽州地区，明代产生进士392名，举人298人；清代有进士226人，举人698人。商贾云集的歙县，明清两代的进士和举人数分别是164人和109人，超过整个徽州地区相应比例的40%。^{[13] (p 192)}成为商人认同传统价值观念的有益注解。

二、前近代商人介入教育的形式

对正统思想的认同，商人有了介入教育的主观愿望；宽松的办学环境，以及在经商中积累的财富，使商人在经商的同时介入教育具备相应条件，商人对教育介入的形式也不拘一格。

(一)“贾而儒行”。“贾而儒行”是对商人自身而言的，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修习儒家典籍，以此指导自身经济活动行为，规范社会经济秩序。他们或“虽寄迹于商，尤潜心于学问无虚日”，^[14]“贾而儒行”，“翩翩有士君子之风”，^[15]以儒家的理念规范自己的商业活动；或由于迫于生计、“由儒转贾”，但仍“雅好诗书，醉心学术”；而制艺不成功者，在从事商业活动中，仍能“循循雅士若儒生”；^{[7] (p. 445-470)}为官不得志而弃仕入贾者，更是“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16] (p 98)}商人将儒家的伦理规范融入商业活动中，成为颇有特色的“儒商”。

(二)延师教子。延师教子是对商人子弟而言。具备了一定经济条件之后，商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嘱其子弟走向制艺之路，并积极创设条件，使其归于儒业。如休宁商人汪太学有五子，“岁延名师督之学”，并严格要求其子弟能勤于学业：“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并“尽出其所订习经书古文词，严程课督。”^[17]又如歙县商人方迁曦与族人议决延聘名师，教诸后生，以“俾后嗣相聚相观以振儒业。”^[18]他们将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于后辈，希望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相应的功名，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

(三)创办学校。家族观念在前近代商人思想中有着重要地位，商人除了延聘名师教育自己的子弟外，还办塾学、设义学、捐修官学、扩建书院，拓展教育规模，扩大教育对象的招收范围，以提高家族、社区、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商人经商成功、或者其他阶层的人士要想成为商人，除却自身的个人因素，还需要一些外部条件，如资本的筹集、用人等，往往得到家族的支持，“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者，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19]即便商人外出经商需要用人时，往往首先考虑宗族中人；若商人在经营过程中与其他商人展开商业竞争，以及在区域性或行业性进行垄断时，更多依靠宗族势力的支持。所以，经商者或经商已经致富者会竭力维护宗族的利益和宗族的繁衍和发展，其手段多集中在建立宗祠和兴办教育上，如清代婺源商人王鸿峯致富后，积极兴办族学，“构讲堂，延师课读，人文丕振，群藉兴育之力。宗祠倾圮，偕弟修葺，焕然一新。”^{[7] (p. 445)}为了提高当地社区和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不同宗族之间联合起来修葺

或创办书院。据李琳琦对明清时期商业繁荣的徽州地区的统计，89所书院中，除了紫阳书院为官方经营和管理之外，其余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民间捐输，并由民间自主经营管理。^[20] (pp. 49—55)

(四) 资助教育。资助教育是商人对教育机构以一定数量经费和修习学子以一定的资金支持。这种资助可根据资助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学生的修业程度、修业效果对学生个人的资金支持，表现为商人为学子资助束修、膏火以完成学业，捐输应考举学子科举资费以通向科举之路，为远赴京都参加乡、会试的学子修建试馆以解决科举考试中的困难等等；一类是为书院、官学等教育机构捐输资金、物资、学田，帮助解决本社区或地区教育发展的经济和物质上的困难，为教育发展提供部分后勤援助。

三、前近代商人介入教育活动的意义

前近代商人参与教育活动，对商人和教育双方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商人而言，由于自身的教育活动尤其用儒家教义来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使得商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一定变化，有儒者风范；从教育方面看，商人介入教育活动，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当然，这是积极方面的意义。与此相对应的是，商人所接受的教育和商人所推动的教育具有同质性并且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其固有的特性——重视政治功能的教育不是因商人的介入而减弱，反而是因此而加强，这一点对商人和教育是相同的，也是主要的。所以，商人与教育发生关系，对双方产生的正面影响不同而有限，但是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却相同而深刻。

前近代商人介入教育活动，对教育的积极作用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普及推广教育。商人介入教育，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规模，对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推广起到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农业发展条件较为滞后的地区，由于商人将自己积累的财富投入教育之中，使得地方教育得以发展和延续。同时，也使得地方教育多了一条获取资金的途经，对弥补地方教育经费的不足以及在官方教育难以到达的地区推行教育，都起到积极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在教育对象方面，它扩大了教育招生面，对商人比较集中的宗族领域或社区中那些聪慧但贫困的学子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流动，尽管这种流动的力量有限、方向单一。其二，在有限程度上动摇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读书入仕是封建教育价值观的核心，也是评价人生的标尺，在文人士子皓首穷经致力于科举制艺的大背景中，出现了一股亦贾亦儒、弃儒经商之风，透露出近代教育价值观念的一缕微弱曙光。其三、从广泛意义上看，前近代商人活跃的商业活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商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动摇重农抑商的封建经济制度，也冲淡了四民阶层的社会秩序，促使移民之风的形成并促成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商人参与教育活动，对商人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商人业贾向儒，使儒家伦理社会规范与商业活动有机结合，商人以实际行动树立起雅商、良商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商人惟利是图的名声，有助于世人摆脱对商贾的偏见，克服贱商轻商观念，使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拥有内在精神追求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商业实践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二，商人意识和商业精神开始融入传统文化中，并形成中国古代特有的儒商精神——重利尚义、崇人文重技艺，尤其是后者，不仅是商人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21] (p. 34.35)

在商人与教育发生关系并对双方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消极影响也随之出现。前近代商人的经济活动没有触动自然经济的根基，自然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建立在这种自然

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教育没有发生变化。虽然商人介入教育领域，使得教育的规模一度扩大、教育对象也一度扩展，但因其教育内容仍然不脱儒家教义，教育的终极指向依然是制艺入仕、光宗耀祖，即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而非教育的经济功能。使商人子弟同样处于“皓首穷经和习八股文，使之充塞绅士的头脑，以至几无时间来独立思考和读书”^{[22] (p. 216)}的制艺之中。当时间迈入近代时，贫乏的商业知识和有限的商业人才难以抵御外来的经济入侵，不得不从教育上寻求商业失利的原因：“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不肖讲求商贾、农工之学”，“读书不能入仕者，除教授外，几至无可谋生”；“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几至“老而不悔”，造就大量“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者，至于有关国计民生、风土人情及兵刑钱谷等实用学科，由于“非素所习”，自然“措治无功”。^{[23] (p. 607, 106)}通商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缺乏相应竟不可得。”^{[24] (p. 74)}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知识、教育、学术被认为是强国富民、抵御经济侵略的法门：“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即破除无用之虚学，代之以能“振百工”、“前民用”的实学。^{[25] (p. 482, 483)}所以，前近代商人介入教育活动，既推动了教育发展、又阻碍了教育的变革，即强化和推动了固有教育发展，阻碍了教育向近代迈进。出现这种结局，固然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制约，但同时受商人主观价值诉求的束缚。

综上所述，前近代商人介入教育没有注入教育以新的因子，也没有将商人在经商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反映在所投入的教育之中，反而自身被纳入到封建教育的轨道，教育发展的目的也不在于促进经济的进步，而是以入仕为官作为目标取向，重视政治功能的教育没有触动封建教育观念及其制度，其结果只能是使中国封建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而以儒家教义为指向的认知材料又增强了前近代商人的封建性，使得其只能沿着封建商人的轨迹发展，难以转变为近代商人。以致著名如晋商、徽商在辉煌数百年之久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当历史迈入近代后，这种僵化、空疏、不敷实用、封闭的教育所导致的弊端与日俱显，商人经商所需要的知识也显得单薄而贫乏，这种特点又由于有了外来的参照显得尤为突出，以致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不得不在借助外力的作用来开启。

注 释：

①据《汉书·食货志》“第四·上”记载：“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丰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縠。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认为商业发展制约着农业的发展。

②如《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记载有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齐桓公说：“欲杀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此有道乎？”管子回答道：“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相恒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勤其事矣。”将农、商对立起来。

参考文献：

- [1] 王孝通. 中国商业史·绪论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 《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 [3] 万历《扬州府志》卷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60，《扬州府部风俗考》.
- [4] 《陕西通志》（雍正）卷45《风俗》.
- [5] 《郭青螺先生遗书》卷16《圣门人物志序》.
- [6] 《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朱批.
- [7] 张海鹏、王廷元.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 [8] 张正明. 明清晋商资料选编 [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下转至第87页）

- [10] 王树槐. 外人与戊戌变法 [M]. 台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第 12 集, 1965.
- [11] 朱有璘. 中国近代史学制史料 (第一辑上册)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12] A·H·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46.
- [13] [日]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 [14] 朱有璘. 中国近代史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册)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15] 大清教育新法令 [C]. 商务印书馆, 1906.
- [16]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下) [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 [17] The Chinese Recorder 1886 [C]. Shanghai.

(上接第 76 页)

- [9] 《祭麓堂集》卷 28.
- [10] 《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支谱》卷 3《柏庭公传》。引自张海鹏、王廷元. 徽商研究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383.
- [11] 休宁雍正《茗州吴氏家典》卷 1.
- [12] 《清圣祖实录》卷 208. 引自张仲礼. 中国绅士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13] 叶显恩.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 [14] 《汪氏统宗谱》卷 42《行状》.
- [15] 婺源《湖溪孙氏宗谱》卷 1《萃峰孙公传》.
- [16] 张正明. 明清晋商及民风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17]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 6《太学可训公传》.
- [18] 《方氏会宗统谱》卷 19《明故处士南滨方公行状》.
- [19] 《茗州吴氏家典》卷 1. 引自李琳琦.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43.
- [20] 李琳琦.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21] 阎广芬. 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办学活动研究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2] 张仲礼. 中国绅士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23] 郑观应. 郑观应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24] 陈炽. 陈炽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5] 薛福成. 薛福成选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